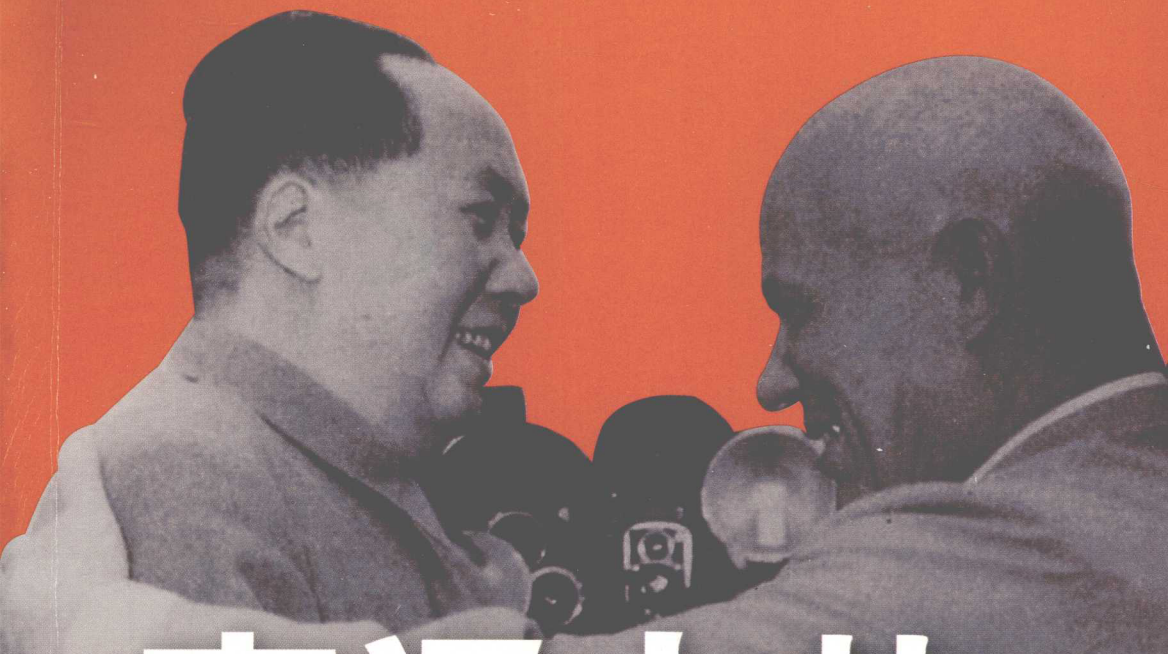
当代中国口述史
Oral History in Contemporary China



直译中苏高层会晤

前苏联驻[redacted]翻译
中苏关系内幕揭秘

[俄]顾达寿 口述　郑少锋 执笔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当代中国口述史
Oral History in Contemporary China

直译中苏高层会晤

前苏联驻华大使馆首席翻译揭秘中苏关系内幕

[俄]顾达寿 口述　郑少锋 执笔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直译中苏高层会晤/(俄罗斯) 顾达寿口述；郑少锋执笔. —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 11
ISBN 978-7-80170-943-1

Ⅰ. ①直… Ⅱ. ①顾…②郑… Ⅲ. ①中苏关系—史料
Ⅳ. ①D822.3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1978 号

Моя жизнь в Китае
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ИВ РАН)
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КРАФТ+настоящим дает свое согласие на издание
Вашей фирмой накитаиском языке книги Р. Ш. Кудашева "Моя
жизнь в Китае"(Р. Ш. Кудашев. Моя жизнь в Китае М.:Крафт+,
ИВ РАН,2008)

中文简体版由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克拉福特出版社授权当代中国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0-6335

出 版 人 周五一
策划编辑 陈德仁
责任编辑 陈德仁 姜楷杰
责任校对 王小芸
装帧设计 古 手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66572154 66572264 66572132
市 场 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80×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3.75 印张 2 插页 插图 40 幅 163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谨以此书

献给我的爱妻库达舍娃·托玛拉·阿伯朱罗夫娜

出版说明

现代史学越来越不满足于文献资料，而求索于人们的记忆。于是，口述史于20世纪40年代在西方勃然兴起，20世纪80—90年代引起中国史学界的关注。口述史让历史的参与者直接对“历史”说话，不仅可以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而且使历史更加鲜活、生动。口述方法更是当代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因为许多事件的当事人健在，他们能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生动地诉说自己参与的那段历史。

新中国诞生六十多年，它谱写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最为壮丽辉煌的篇章，对当代中国史的研究是一项应大力加强的工作。毫无疑问，参与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的老同志的记忆对于国史研究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他们年事已高，自己动手困难，访谈并整理他们的口述，成为十分紧迫而带有抢救性的工作。作为国史研究专门机构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建立伊始，就十分重视口述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并由《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陆续发表了一些口述史方面的成果。我们意在将这些成果汇集出版，并由此进一步萌发出版《当代中国口述史》丛书的想法，以此汇集和整理亲历者记述当代中国史的资料。在酝酿这套丛书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些亲历者可以自己动手撰写，有些亲历者生前对其亲人讲述过自己所亲历的事件或与一些要人交往的情形，其亲人以回忆的形式述出。很显然，这些记述都是十分宝贵的当代中国史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料，因此，我们也将它们收入这套丛书中。

《当代中国口述史》丛书的首要宗旨是存史，为当代中国史研究者提供可信的史料。而史料的生命在于真实性。因此，丛书所收以亲历者的叙述为主体，无论是口述、自述，还是回忆录，都必须是亲历者作为事件的当事人、决策者或参与者对事件的叙述。而且必须是以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叙述。当然，完全避免情感的因素不仅不可能，而且会使之失去鲜活性。但情感的倾诉应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如果是对口述的整理，整理者应对事件背景有必要的了解，要对关键的情节、关键的人物以及时间、地点作必要的查证。同时，要理顺叙事逻辑。文采不求飞扬，但必须成诵。

这项工作既已开始，就要扎扎实实做下去。亲历的内容十分丰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外交及个人生活史、家族史都可涵盖；亲历者可以是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也可以是普通老百姓，总之，工、农、兵、学、商都可以成为本丛书的作者。他们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叙述当代中国的历史，可以记录下一个比较真实的当代，对于丰富国史内容，弄清历史真相，总结历史经验，资政育人，都是大有裨益的。

我们希望本丛书能够成为当代中国史研究者的资料库，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增益智慧的智囊团，成为关心共和国成长和命运的中国公民的图书馆。

当代中国出版社编辑部

书写中俄友谊的新篇章

刘古昌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与幅员最大的俄罗斯经历了几度风雨沧桑，在历史的变迁中终于跟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恢复和发展了两国的友好关系。如今，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们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邻国又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共同开创了中俄友谊的崭新时代。

回首往昔，中共与苏共两党之间的关系曾经发生过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导致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出现长期冷凝封冻。而今，坚冰已经消融，中俄两国重修友好。然而，这段岁月风云曾经留给人们许多难忘的记忆。

喜看今天，中俄两国在经贸、科技、文化、教育各个领域里已经付诸实施和正在进行的合作与交流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我们两国人民告别了昨天，医治了创伤，携手并肩，走向两国关系史上光辉灿烂的明天。

展望未来，我们仍有理由相信，饱经忧患、励精图治的中国人民与经历了改革阵痛的俄罗斯民族，将继续巩固和发展业已建立的两国睦邻友好和战略伙伴关系的成果，共同描绘和书写中俄友谊不断创新的蓝图篇章。

2006年元旦于莫斯科

（刘古昌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俄罗斯联邦特命全权大使）

序

岁月风云的记忆

阎明复

前苏联资深外交官库达舍夫（顾达寿）是我的老朋友。他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由苏联铁道部派遣在哈尔滨的长春铁路局任职中文翻译，以后又由前苏联外交部派遣到驻华使馆工作了12年。1957年夏天毛泽东主席在杭州会见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特使、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时，我和顾达寿分别作为中方和苏方的翻译出席了那次当时尚未对外公开的会晤。我记得是在那次会晤中毛泽东主席很欣赏这位通晓中文的年轻的苏联人，特意给库达舍夫取名顾达寿。我与顾达寿从那时起开始相识，以后我们又多次在中苏高层领导人的互访会谈或外交会晤中相遇并且相交至深。在我的印象中，他为人正直、待人谦和，特别忠于职守，倍受当时的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的器重。不久，他即被提升为前苏联驻华使馆公使衔政治参赞兼党委书记。上个世纪70年代初，顾达寿奉调回国。那时候，中苏关系已经全面恶化，此后，在很长时间里，我与顾达寿的联系中断了。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苏开始恢复友好邦交。1991年夏天我率团赴莫斯科访问时，特别想见到我的老朋友顾达寿。于是，我便委托我们的使馆找到他并安排了我和他会面。那年我和他都已年过花甲，而且我们已经分别将近20年。尽管岁月在无情地催人快老，但我看到他的身体依然非常健康。我和他久别重逢在我们记忆犹新的红色故都莫斯科。风云变幻的岁月留给我们许多

感慨。那年，他虽然已经从苏共中央退休而闲居在家，但他非常希望能再为中苏友好发挥余热，做点事情。我非常理解他的心情和愿望，于是便请我们的王荩卿大使向莫斯科的中资机构推荐他。之后，王大使将他介绍到中国丝绸进出口总公司驻莫斯科代表处当顾问和翻译。我从他给我的来信中知道他在那里工作得很愉快。这以后，我了解到他在莫斯科中丝代表处一直工作了7年，从1998年起，他应聘在中国欧洲商业投资中心驻莫斯科代表处任高级翻译。迄今他已经在那里工作了11年。

两年前的夏天，顾达寿应邀赴井冈山出席毛泽东诗词研讨会。会后，他到北京与我再次阔别重逢。我专门邀请他和老朋友在一家酒店聚餐小酌。席间，我发觉他已显苍老，健康状况大不如前，又得知他的夫人已经去世，我想他不免会有苍凉孤独的心态。那时我也早已离休，与他似有些许同感，便借用古典诙谐地问他："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他便一改愁容，引用曹操的一首诗朗声答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终于明白他仍不服老如当年那般用心致力的精神所在。

顾达寿是前苏联的一位资深外交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王稼祥、郭沫若等我国老一辈领导人对他都很熟悉。他多次作为苏方首席中文翻译陪同苏联首脑和高层领导人出席中苏高级会晤和重要会谈。他在苏联驻华使馆工作期间正值中苏关系发生演变的历史时期。他亲身经历了我们两国两党之间的关系从最初的传统友好逐渐走向淡化进而开始破裂以至全面恶化的全过程。值得庆幸的是，在他长达30年的外交生涯结束后，终于又看到了我们两国人民恢复友好邦交的现实和前景。他所经历的岁月风云是我们那一代中国人和苏联人曾经记忆深刻而难以忘却的历史。我们今天回忆起那段已经流逝的风云岁月，便油然而生沧桑之感慨。如今中俄两国人民重新携手结为世代永不

为敌的友好睦邻和紧密团结的战略伙伴。这也是我们两国领导人高瞻远瞩，顺应历史潮流而造福于后人的英明所在。

顾达寿的回忆录《直译中苏高层会晤》是他对我们那一代人所经历的岁月风云的记忆。我想，这本书的读者，包括我们的下一代，也将从中了解那段深沉的历史记忆。

2009年秋天于北京

目录

001 前 言

008 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中文

东方大学有很多来自欧亚东方国家的共产党人在这里学习，其中也包括后来成为中国的著名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杰出人物，如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还有曾经在中共中央任职的著名俄文翻译家师哲等人。

016 为中国第一夫人当翻译

我被委派担任即将来莫斯科治疗的毛泽东夫人江青的翻译。/ 为江青看病的是苏联著名的妇科大夫。/ 她没有向我谈她自己和她的身份，也没有谈及毛泽东和中国。她只说她名叫李进，是中国文化部的普通干部。/ 医院为江青安排的几次妇科检查和专家会诊，都是由我隔着一道屏风担任翻译。/ 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将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学生派去给中国第一夫人当翻译。

023 在长春铁路局

我第一次到哈尔滨就感觉到这个中国北方城市有许多俄罗斯的特色，就连哈尔滨人的某些方言也同俄语相似。/ 在哈尔滨的长春铁路局有两个俱乐部，一个是中国铁路员工俱乐部，另一个是为我们苏联人开办的俱乐部。/ 董力说：“我们对你比对其他苏联人更亲切。这是因为你会中文。”/ 周恩来让秘书记下了我的名字，亲切地对我说：“你的汉语说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很好，希望你为中苏友好继续努力工作，我想我们以后还会在北京见面的。”

041 进入苏联外交部

苏联外交部决定派我到苏联驻中国天津总领事馆任翻译兼秘书长。/ 应邀出席新中国诞生五周年检阅的外宾中只有我们苏联人。这是中国人对苏联人的最高礼遇。/ 中国人听说我们苏联人的主食是面包，喜欢吃香肠，市领导便亲自过问，指示市粮食局立即给予我们领事馆保证足够特殊供应的待遇。/ 在北戴河的宾馆里，陈毅向我介绍了他的四川同乡郭沫若。/ 从 1957 年至 1959 年这三年中，我经历了苏中两国外交关系史上的三件大事。/ 面对热情欢呼的群众，赫鲁晓夫感慨颇深。他对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的十年巨变深表佩服。/ 我接到中国外交部的电话，称周恩来即日将在外交部约见我。周恩来和我握手拥抱，亲切地对我说：“顾达寿同志，这件事让你受惊了。”/ 我们很快收到了来自莫斯科的电报命令，指示我们可以在现场取下林彪的头颅，……林彪的头盖骨现在还应该保存在莫斯科。

084 翻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始末

当刘少奇向尤金大使通报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开展“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决定时，我在脑子里就开始琢磨如何正确翻译他所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两个在俄文里还不曾出现的新政治术语。/ 尤金大使严肃地问我：“你翻译的这两个词义是否准确？”/ 我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俄文翻译首先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确认。

090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北京会谈纪实

当我翻译完赫鲁晓夫的发言时，毛泽东的面容立即显现出异常反感的表情，以一种鄙视的目光盯着赫鲁晓夫，但他克制着没有发怒。/ 毛泽东对一系列政治敏感问题的鲜明立场，使赫鲁晓夫明显感觉到谈判的气氛对苏联方面不利。/

赫鲁晓夫似乎感觉到毛泽东刚才是在骂他什么。于是他问我："毛泽东刚才是不是在骂我?"/赫鲁晓夫已经感觉到毛泽东对他的建议和意见并不感兴趣，而且也不会听他的。/赫鲁晓夫在天安门城楼听到人们高呼万岁时，突然产生对这位中国人民的领袖的某种惊异之感。/毛泽东已经感觉到陈毅的发言明显伤了赫鲁晓夫和其他苏联领导人的面子，但他却未加制止，甚至一次没有打断陈毅的措词强硬的发言。

115 **毛泽东与米高扬杭州会晤纪实**

米高扬此行不属于正式访问，故中国方面一切都是秘密安排的。/米高扬向毛泽东和在场的中国领导人详细讲述了关于苏共中央清查莫洛托夫等人的反党集团的经过，列举了他们企图篡党夺权的"罪证"。/米高扬确信毛泽东已代表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全会决议的支持表态，终于松了一口气。/米高扬笑着对我说："祝贺你荣获毛泽东主席授予的中国命名!"

129 **周恩来与柯西金北京会晤纪实**

在克里姆林宫部长会议主席办公室里，柯西金一见到我就说："我请你来是要你给我接通北京的电话。我要直接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通话，谈我对苏中目前关系的看法。"/女接线员还未等我将话说完，就很不礼貌地说："告诉你，我们的毛主席坚决不与苏联修正主义坏蛋柯西金通话，所以我不能给你接通毛主席的电话!"/周恩来对柯西金说道："既然在事关两国边境边防问题上的是非分歧严重存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又何谈两国关系正常化?"/我们在北京受到接待的档次和礼节使柯西金作为一个大国的政府领导人不免感到有点委屈。

137 **周恩来在克里姆林宫**

周恩来没有接受我们安排给他乘坐的专机，却建议我与他乘坐他的专机伊尔—18飞往莫斯科。/当苏联领导人会见

各国代表时，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走到我跟前，让我与他一起去见周恩来。/ 我看到周恩来的眉头紧锁，怒容满面，显然他的翻译已经将马林诺夫斯基刚才说的话告诉了他。

145 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

我在中国哈尔滨曾经到一个普通中国人家中做客，看到他们家里的正面墙壁上都有毛泽东的画像，两边贴着“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的红色对联。那时，我深切地感受到中国人民对自己的领袖的真挚感激之情。

157 百年回忆邓小平

当周恩来发言时，邓小平从不插话，末了他表示完全赞同。/ 他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讲述着他打乒乓球受伤的经过。这时在我们面前的邓小平，全然没有他在外交场合表现的那种审慎和寡言少语的严肃表情。/ 毛泽东向赫鲁晓夫介绍在场的中国领导人时，特别提到邓小平，高度评价他非凡的组织能力。他对我们说：“别看我们的邓小平同志是小个子，他可是中国政坛升起的一颗新星。”

183 后 记

前　言

20世纪的苏联和中国在风雨飘摇中走过了艰难的路程。两国人民各自经历了长期的革命斗争，终于推翻了腐朽的封建统治，在世界上先后建立了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曾经风雨同舟，共同对敌，组织武装力量打败了帝国主义的侵略，领导人民在战争的废墟上建设自己的国家，日益走向富强。历史不会忘记两国人民曾经结成的深厚友谊。

然而，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时期里，苏联和中国的关系经历了从友好到破裂至恢复和发展的历史演变过程。这是一个曲折而又漫长的过程。早在我们两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时期，苏联共产党支持中国的军队抗击日本对华侵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的关键时刻，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后，立即出兵中国东北，援助中国军队最后打败了日本侵略军。以苏共为首的共产国际与执政前的中共就已经建立了非常紧密的联系和非常亲密的关系。新中国诞生后，苏联第一个承认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派遣大批工程技术专家援助中国的经济和国防建设。中国也派遣留学生和技术人员到苏联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应该说，是斯大林和毛泽东亲手栽培了苏中两国的友谊之花，从蓓蕾

初绽到含苞怒放，我们两国人民为它的发育和成长付出了许多心血和汗水。

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末，苏中两党、两国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和戏剧性的变化，迅速从淡化趋向恶化。起因是在1958年夏天和1959年秋天的两次苏中首脑会谈中，赫鲁晓夫与毛泽东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产生分歧，双方各持己见，互相指责，以致矛盾不可调和，进而使两党分道扬镳，两国关系处于敌对状态。那时候，我曾作为苏联外交官在苏联驻华使馆任职，并且两次作为翻译陪同赫鲁晓夫在北京与毛泽东和中共高层领导人会谈。我将这两次会谈的真实情况在本书的《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北京会谈纪实》一文中作了披露，并且根据我的观察和感受对苏中关系的演变作了粗浅的分析。读者从中可以管窥到苏中关系在那个时期所发生的变化的缘由始末。

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大地。在这个时期的苏联，赫鲁晓夫于1964年10月下台，勃列日涅夫当政。1964年10月30日，勃列日涅夫邀请中共代表团来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7周年的庆祝活动，借以缓和苏中两党的不正常的关系。但在11月7日，却发生了时任苏联国防部长的马利诺夫斯基在一次非正式的谈话中影射诋毁毛泽东的事件。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当即对此事提出严正抗议。这个没有公开的历史插曲实际上已经破灭了苏中两党和解的可能。本书中《周恩来在克里姆林宫》一文真实地披露了我目击的这个历史镜头。

毛泽东认为苏联共产党已经变质，并且已经堕落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现代修正主义。他号召中国人民继续坚持反对苏修的斗争，同时清除中共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时期的苏中关系加剧恶化，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两国都在加紧扩

军备战。1969年春天在两国边境的一个孤岛即达曼斯基岛（我珍宝岛——编者注）上发生的军事冲突，致使苏联成为中国人眼中的头号敌人。在此期间，苏联领导人曾经试图改善日益恶化的苏中关系。珍宝岛事件之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曾经首先建议与中国领导人对话，但遭到拒绝。是年秋天，我随柯西金赴越南首都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的葬礼，返回莫斯科时绕道北京与中国总理周恩来进行了已中断五年的苏中高层领导人会晤。这次历史性的会晤使苏中边境的紧张局势得以暂时缓和。关于这一时期苏中关系的微妙变化，我在《周恩来与柯西金北京会晤纪实》一文中作了较为详尽的叙述。

1976年中国党政军的三位开国元老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谢世，是年10月，历时十年的“文革”运动宣告结束。自从柯西金冲破阻力，与周恩来在北京会晤之后，两国似乎结束了相互为敌的局面，但是在这之后近20年里苏中关系仍处于冷凝封冻的状态。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先后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然而他们均因年迈和罹病，上任一年多后相继病故。据我所知，勃列日涅夫之后的苏联领导人，不论是安德罗波夫还是契尔年科，都曾经考虑与中共新的领导人通过对话和会谈来消除隔阂和分歧，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应该说，从勃列日涅夫执政之日起，当年苏联的老人政治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优化和改革。一些老一代的苏共领导人依然墨守着僵死的马列教条和观念，他们未能及时思考和解决如何制定新的对内对外政策，特别是研究如何妥善处理和改善苏中两国的外交关系等重大问题。因此，改善苏中关系、恢复苏中友好的历史使命实际上便落到了两国新一代领导人的肩上。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当选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终于意识到改善对华关系的重要性。他当政后以他的“新思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